

湖南农业生产大跃进丛书

我们是怎样 实现早稻千斤县的

中共醴陵县委员会写

湖南省经济建设展览会主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編號：(湘)1161
我們是怎样實現單稻千斤舉的

主編者：湖南省經濟建設展覽會

寫者：中共鳳慶縣委會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湖南省省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號)

長沙市新村路

印刷者：湖南印刷廠

長沙市泰陽中路

發行者：湖南省新华书店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1958年9月第 一 版

印張：3/4 1958年9月第 一 次印製

字數：16,000 印數：100,000

統一書名：16109·68

定 价：(5)七 分

我們是怎样實現早稻千斤县的

醴陵县今年早稻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大丰收，全县四十八万三千多亩連作早稻，平均亩产达到1,093斤，比去年早稻亩产440斤增加了148%；总产量达到五亿二千七百多万斤，比去年早稻总产量二亿七千万斤增加了93.5%（去年早稻种植面积是62万亩，今年因扩种經濟作物等原因，种植面积比去年减少了22.1%）。全县46个乡，实现千斤以上的乡有44个。其中清水江乡13,546亩田，平均亩产达到1,507斤，比去年早稻平均亩产增加275%；全县823个社，实现千斤以上的社有629个，其中清水江乡清冰江社2,704亩田，平均亩产达到1,755斤，比去年平均亩产增加195.9%。在这大面积丰收的基础上，还出现了許多高产“卫星”，如沈潭乡鳌仙社1.43亩田，亩产15,665斤12两，其他亩产四、五千斤以上的高产纪录，全县还有不少。

在粮食生产飞跃发展的同时，多种經營也正在全面跃进。全县的主要副业生产門路共計有六十余項，到六月底止，已收入現金九百多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50%。养猪448,163头，平均每戶3.1头，比去年同期增長74%；养魚2,096万尾，比去年增長一倍；扩种黃麻、糖蘿卜6,510亩，比去年增加一倍以上。

农业生产大发展，农民生活也相应地有很大的提高。預計全年每人平均产值将达到250元以上；粮食除完成国家征購任务外，每人平均將有用粮一千斤（口粮七百斤、种子二百斤、储备粮一百斤）。

带来了无限的欢乐。农村里捷报频传，歌声四起，广大农民兴高采烈，意气风发。他们这样歌颂早稻的丰收：

“今年奇迹万万千，
禾苗越看越心甜，
党的领导真伟大，
一天胜过二十年！”

老年农民望着漫山遍野黄金般的谷穗，更是笑得合不拢嘴，感慨万千。均坝乡子規社陈金寿老汉作了一首意味深长的诗：

“老汉今年七十多，皇帝见过两三个，
看的事情不算少，这号早稻未见过。
多少年的老规矩，今年一下被打破；
往年田无三寸土，今年深耕七寸多；
往年稀插八、九寸，今年密植四万蔸；
往年地里没肥下，今年每亩两千多。
丘丘丰产真惊人，每亩能收一千零；
金黄谷子堆满仓，社员个个喜洋洋。”

“农业生产有限论”、“增产到顶论”、“条件论”等等右倾保守的论调，在这丰收巨浪的冲击下，一齐破产了。“观潮派”、“秋后算账派”在这铁的事实面前，哑口无言地服输了。泗汾乡琪田社上中农周启福，在春耕时曾经对社干部说：“农业社要作出我过去那样的禾，起码要十年。”现在他的口气变了，在一次座谈会上他说：“农业社真有本事！我们作不出好禾的田，农业社偏偏作出了好禾。万万想不到一年就远远地超过了我！”极少数自恃生产条件好，坚持搞单干的老上中农，现在也动摇了，三番五次地申请入社了。清水江乡老上中农张运生，从1955年起，与农业社

較量了四年，他一直不認輸；可是到了今年早稻成熟的時候，他眼睜睜地看見自己被遠遠地甩在後面，心里急起來了。七月十二日天一亮，就急急忙忙找着楊木壠農業社的社主任和黨支部書記，堅決要求入社。在社里的歡迎大會上，他紅着臉口服心服地說：“我比不過社會主義！”

現在農村里是紅旗高舉，“衛星”紛飛，廣大農民歡欣鼓舞，斗志昂揚。“跃進再跃進，高潮更高潮”，已成為全縣農民的實際行動，他們正以十倍、百倍于早稻的干勁，來爭取晚稻更大的丰收。均壠鄉司梅橋社就豪邁地唱出了：

“鼓足干勁冲破天，

壯志凌云賽神仙！

苦戰南田十晝夜。（南田是該社的地名）

醴陵全縣我爭先！”

醴陵縣早稻大丰收，是黨的“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的勝利，是全縣廣大農民、干部在省委、地委的親切領導、大力支持下，苦戰苦干的結果。現在把我們在這方面的幾點體會，整理分述于后。

生產大躍進，是多數群眾內在的迫切要求，但由於人們思想受着很多舊的影響，開始，對實現1,500斤畝的規劃的認識很不一致，這主要反映在下面兩個問題上。一是能不能躍進，躍進多少，今年稻谷生產指標多高的問題，二是怎樣躍進，也就是用什麼樣的措施辦法來保證規劃指標實現的問題。當县委把規劃提交給群眾討論時，一時各方面議論紛紛，很多人懷疑規劃不能實現。

生产基础較好的东南乡，主要反映着生产到顶的自滿思想；条件較次的西北乡，则較普遍地流行着“田多、劳少、底板差”的悲觀論調。还有的人斷言我們不能实现规划，他們說：“醴陵几年搞千斤，冒一年搞成，若要搞成功，除非連桿一把称，或用‘唐四’、‘宋八’的秤来称（注：唐四即唐朝一斤合現在的四兩，宋八是一斤合八兩）。泗汾乡琪田社老上中农周启福非常狂妄地说：“农业社人齐心不齐，要赛过我过去的生产水平，起码还要十年。”不但如此，他們对实现指标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也是顧慮重重，抵触很大，如怕密植不結实，易倒伏，工夫难做等。轉步乡石湾社老上中农周序湘說：“搞咯样密，只能牽狗踐田，用胡夾扯草，用飞机下肥。”泗汾乡过泗桥有个名叫李桂发的老上中农，还刻毒地说：“插咯样密，將來是蔸蔸三穗，穗穗三粒，中間一粒凹，兩头兩粒白。”接着又补充一句：“看吧！那时（指秋后）莫說1,500斤，只怕150斤都冒得。”以上情况表明：要把全县平均亩产1,500斤的规划变成群众的实际行动，在全民中开展一場大論战，是十分必要的。这場斗争包含着先进与保守的斗争，資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也就是兩条道路、兩条路線的斗争。斗争是尖銳的，但又都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因此，我們决定采取大鳴大放大辯論的办法。作法的大体过程是首先圍繞着1,500斤指标开展大辯論，然后再开展以增产措施、三包五到丘、三結合为中心內容的辯論，最后轉入“作什么辯什么”的經常性辯論。在辯論过程中，我們認真总结介绍了本县1957年的高产典型，如山穷水惡的大林乡赤竹社一百二十九亩多田，平均亩产达到1,102斤；桃花乡楊家湾社密植 4×4 寸，一季就平均亩产960斤；黃沙乡企石社連年都获得了千斤丰产；大障乡新联社的高額丰产田亩产达到

2,287斤。与此同时，我們还組織全县队长以上干部数千人去赤竹、企石等千斤社參觀学习。他們參觀回去以后，即领导群众展开了全民大辯論。辯論中大家都紛紛提出：“他們能做到，我們也就一定能够做到。”广大群众的思想逐渐解放了，敢想、敢說、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也逐步形成，各个乡、社邊辯論，邊对比，就邊提出自己的奋斗目标，掀起了学先进、赶先进的热潮。之后，县委又組織了大部分县委委员、全部乡党委第一書記、少数社干去湖北孝感參觀，着重考察学习他們的密植方面的經驗。隨后，又根据省委的指示，运用兩比（比去年生产条件、比各种高产典型）、十算賬（算思想、水利、肥料、人力、牛力、資金、种子、技术、时间、口粮等十笔賬），使群众比較全面系統地看到了今年生产的有利条件，打破了怀疑、顧慮和抵触思想。全县通过这样摆事实、講道理，历时一个多月，参加人数达成年人的90%以上的全民大辯論，实现1,500斤县的规划和措施，开始在群众中生根落脚了！各乡、社、队就相繼訂出了本地区的先进生产规划，自觉地发起为实现规划的签名运动，生产就更加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了。

我們感到：整个生产大跃进过程就是大辯論的过程，右傾保守思想不破除，資本主义思想不駁倒，就不会也不可能有多快好省的生产跃进形势。我們还感到当前农村以富裕中农为代表的資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兩条道路斗争不仅存在，而且比較突出。如上面所說的富裕中农李桂发之所以那样反对密植，并不止是由于思想保守，而是有更深的根源。他家解放前有21亩田，家里两个劳动力，經常雇些短工，生活水平比貧农和下中农高得多。合作化以后，資本主义自发道路被堵死了，他觉得沒有什么搞手了，兩父子都消极怠工，1957年兩個劳动力总共只做了一

百二十多个劳动日。今年他对农业生产大跃进更是抵触、反对，他觉得“密植会累死人”，因此就到群众中去放肆讲密植的坏话，認定我們的规划无法实现，与我們争夺群众。对这种人我們仍然采取了摆事实、講道理的办法，彻底地揭露和批判了他們的資本主义思想行为。辯論后，他們一般地都有了轉变，如李桂发最后也檢討了是留恋資本主义道路，对搞社会主义不感兴趣，表示要好好改正。广大貧农、下中农也从这里提高了觉悟，积极性更高了。他們說：“我們就是要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决搞大跃进。”因此，我們不能低估了富裕中农的資本主义倾向，必須与之进行斗争；但又必須注意不要把群众中先进与保守的斗争，和資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兩条道路的斗争混同起来。

二

整个生产大跃进可以说就是一个全民性的社会主义大竞赛。这种竞赛首先是由县提出“赛过红安，赶上孝感，一定实现一千五百斤县”这个响亮的口号开始的。我們派出由大部分县委、全部乡党委第一书记組成的參观团去孝感參觀，学习他們的增产經驗，特別是密植方面的經驗，在全民中开展討論，并发起学孝感、赶孝感的签名运动。以后，兩县互派觀察員互通訊息，交流經驗。这对我国早稻丰产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現在，已不止是县和孝感、红安在赛，乡与乡、社与社、队与队、部門与部門、人与人之間都在赛，学先进、赶先进、賽先進已成为了新的社会风气。三月初，全县尚只积得肥料2.3亿担，平均每亩只有285担，当时，仙霞乡每亩已达到1,000担，其中赵家塅农业社每亩已达到1,800担。县委即在該乡召开了乡、

社現場會，會上提出了挑戰應戰。連夜，神福港鄉組織五百多人在趙家塅社參觀，交流了經驗，學習了趙家塅社積肥辦法，回去後發動了一萬多人，日夜苦戰了一十三天，每畝積肥數字就達到了1,650擔。全縣的積肥工作，就是這樣你追我趕，提前超額完成了每畝1,600擔的任務。不管是風霜雨雪，也不管是暑熱炎天，在興修水利，在改造低產田，在積肥造肥，在搶插早稻，在防洪搶險，在搶早插晚中，一句話，在整個躍進過程中，全縣出工人數始終占總人口的60—70%。人們這種旺盛的革命熱情，萬難無阻的堅強意志，征服自然的英雄氣概，是表現得十分生動、強烈的，普口市鄉農民這樣說：

“我們的決心似愚公，
我們的干勁賽武松，
我們的力量比天大，
我們的熱心似火紅。”

這是全縣人民的共產主義風格的最好寫照。去冬今春興修水利、改低產田，都是在風雪交加、道路泥濘的惡劣氣候條件下進行的，他們自豪地說：

“與嚴寒比狠，
與時間比快，
與愚公比決心，
與泰山比高低！”
“天冷冷不了熱心，
地凍凍不了決心，
大雪蓋不了信心，
狂風吹不動恒心！”

全县原計劃修水利工程 14,595 处，需工 677 万个，在这样顽强战斗下，比原計劃多修了 575 处，用工比原計劃增加 17%，土方达到了 770 万方，为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兴修水利用工总数的 66%。在搶季节搶火色的忙迫时刻，人們就这样提出：

“ 赶早摸黑当半天。
汽灯底下当白天。
一天工夫当兩天，
完成任务要当先”。

所以，我們的插早插晚以及其他一些季节性最强的工夫都提前完成了。竞赛开展以来，一反过去工作中打折扣 欠尾賬陋习，这是跃进中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

在大跃进中所涌现出的英雄人物的忘我劳动、自我牺牲的精神，更是十分感人。官庄乡新桥社刘家湾队队长何建冬，在兴修水利中，为了实现计划，日夜带头苦干，一连七天七夜没有睡觉，肩膀压肿了，兩腿跑肿了，他仍然鼓动社員摆擂台，与健将比高低，坚持不肯休息，直到病倒了，四肢不能撑持，才肯离开工地，在昏迷中还高喊着“快脱衣，好担土”。稍一清醒过来，就向前来慰问他的社干、社員問生产进度，布置工作。何建冬其人就是这种万难无阻、自我牺牲精神的化身。

生产大跃进以来，人与人、部門与部門、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协作精神大大发扬了，人民内部空前团结了。富里乡的中南农业社与江西萍乡的小水社交界，过去在地主惡霸的操纵下，互不团结，兩社共处的一条麻石街，过去叫做“麻紗街”，意思是糾紛不息。今年不同了，关系好了，人心变了，生产推动了。半年多来他們互相參觀生产，互相提出竞赛。在兴修水

利中，中南社組織200多人支援小水社；中南社修路时完不成任务，插秧时少了粳稻秧，小水社又支援中南社。他們互相学习，互相竞赛，真是昔日“冤家”，今日战友。王仙乡的石湾社与虹桥社竞赛，五月間，虹桥社的禾苗比不过石湾社，石湾社的社員就把肥料送給虹桥社的社員，并對他們說：“我們希望你們的禾也長得好，希望我們自己的禾比你們的更好。”

我們深深体会到，党的“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和共产主义的思想，一經被群众所掌握，就能产生巨大无比的物質力量。醴陵县的早稻大丰收，就是党的总路綫的胜利，就是党的群众路綫的胜利！

三

醴陵县种双季稻已經有了近兩百年的历史，积累了不少經驗，有一定的技术基础。但按农业生产大跃进的要求，原有技术則还相差得很远，特別是耕作制度上还存在着兩大漏洞——稀植和間作。稀植單位面积内蔸数少，不能大量增产；間作早晚稻互相爭奪阳光、肥料，而且又不能高度密植，所以产量也不高。近几年來我們虽然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但直到1957年，仍是稀植 8×8 寸、 8×7 寸（連作）和1尺多（間作），間作双季稻还占总田亩的35%左右。据此，我們1958年采取了密植、深耕、增施肥料、改間作为連作等一系列的技术措施。随着这些新的技术措施的貫彻，工作量大大增加，又帶來了劳力不足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县委采取書記挂帅，全民动员的方法，开展了一个規模巨大的学习、推广先进技术 and 改革工具的群众运动。整个运动过程中，我們牢牢地抓住了先进

思想与保守思想的斗争，抓住了如下几項主要措施：

一、抓住以密植为中心的农业技术大改革。今年，在考察了本县和外地密植丰产的經驗以后，县委便决心抓住密植为綱，推行一系列改革。首先是推行高度密植，由每亩七、八千蔸改为每亩四万蔸以上。其次是將原有的35%的間作双季稻田，除0.6%左右的冷浸田、深脚泥田外，全部改种了連作双季稻。再次是由于單位面积的蔸数增加了，肥料也就必須随着增加，土层也必須加深。早稻每亩平均施肥底肥达1,300担，追肥200担，化肥4斤，比去年每亩平均施肥二百多担增加了六倍多；深耕由原来的三寸多普遍加深到4寸半以上。第四是早播早插。全县今年在“春分”前六、七天浸种，“春分”边播种，“谷雨”后兩天插完秧，比往年提早了六、七天；早稻提早了，就能搶住晚稻的季节，全县的晚稻在“立秋”前五天就都已基本插完，为兩季丰收打下了基础。第五是培育健壯秧。在育秧的方法上，全部改过去的育水秧为育湿润秧；寒潮期間，又加强了护秧保苗工作，普遍設置防风棚，在发生冰雹和暴雨时，用門板、晒簾等盖秧，不少群众甚至把自己的棉絮、蚊帳、睡席等也拿出来盖秧，因而沒有爛秧，秧苗根根茁壯，为早稻丰收創造了先决条件。第六，加强田間管理，消灭不平衡。今年普遍实行了“三防三保”的田間管理个人責任制，及时进行了中耕追肥，坚决消灭了三类禾。今春，禾苗刚插下时，各地就立即进行了一次查蔸补苗。之后，一般又都开展了三、四次群众性的檢查評比，逐丘、逐块乃至逐蔸鉴定禾苗，边鉴定就边研究补救办法，对三类苗和二类苗及时进行了加工追肥。因而，今年的早稻不平衡的現象大大减少了。第七，大改低产田。这里所講的低产田，一般是深泥

冷浸田、滂田、蔭山田、淺泥田、山洪田、瘦田、天水田等，往年产量很低；一般亩产只有二、三百斤，多的四百斤。去冬今春我們改良了12万亩，这些田的早稻产量就增加了几倍甚至十几倍，充分显示了改良土壤的巨大潜力。

醴陵县早稻生产的实践證明：要求提高單位面积产量就必须密植，每亩三、四万蔸，不是密了，而是稀了。根据我們的对比試驗結果，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3×3 寸的6万多蔸比 3×5 寸的4万多蔸产量高， 1×1 寸的單株密植又比 3×3 寸的高。所以那些認為“稀禾結密谷，禾密一把秆”的論調是完全沒有根据的。密植就必须深耕、增施肥料。有人顧慮“肥多会倒禾”，这也是不必要的。問題是肥多了必須合理施放，即什么时候施，施什么样的肥，都必須恰当合理。實驗証明：密植必須肥足，特別是底肥要足。

二、战胜自然灾害。为了战胜旱灾，去冬以来掀起了历史上未有的兴修水利高潮，全县去冬今春共修建了水利工程15,170处，用工791万多个，并安装了抽水机124台。由于大修水利工程的結果，全县有30个乡，616个社，52万多亩田基本上实现了水利自流化，能抗旱60天左右。入春以来，又注意了引水灌塘，水源缺乏的地方还采用了抽水机灌塘的办法，基本上达到了塘塘水满。同时，各社还重新规划或調整了灌区，确定了三定包干（定灌溉面积、定抗旱能力、定工分）的專人放水责任制；添置和修理好了抗旱工具。由于作好了这些准备工作，因此，在六月下旬到七月上旬旱象露头时，我們就有效地开展了群众性的抗旱斗争，使今年早稻完全避免了旱灾损失。

在早稻插下后不久，由于天雨連綿，全县曾发生兩次山洪

暴发，有18万亩田遭受了水灾。但在县委和乡党委的领导和带头行动下，动员了18万余人进行抢险，经过了几天几晚的苦战，修筑了190余里长的防洪大堤，抗御了洪灾。洪水过后，各地又及时动员了广大群众洗禾补蔸，受灾严重的6,000多亩重插了一次，9,000多亩改种了别的作物，基本上没有造成损失。与此同时，广大群众又想方设法，扩种了高粱等各种粮食作物2万多亩，从积极方面进行了补救。

在治虫方面，去冬进行了冬季“三光”，今春以来又普遍进行了秧田治虫；插秧后，又先后进行了两、三次大规模的使用药剂扑杀与“千灯万火”诱杀相结合的治虫运动。早稻扬花后，全县曾发生严重的蜢子虫（浮尘子）为害，我们又及时动员了各乡各社集中全力进行了扑灭。在劳力万分紧张的双抢运动中，各社一般还抽出了专人负责治虫。全县总共用了滴滴涕和六六六等药剂达四十九万多斤，共出动了八千多部喷雾器。为了解决药械不足的问题，全县各乡共兴办了191个土药工厂，制造了四十余万斤土药，收效很好，还节省资金达四万余元。从目前看，由于坚持向虫灾作斗争，基本上贯彻执行了治早治少治了的方针，因而大大减轻了虫灾的损失。治虫工作做得好的南乡，损失极为轻微。但有个别地区，由于重视不够，特别是对后期发生的蜢子虫，没有及时组织力量突击扑灭，结果受灾严重，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为了防止禾苗倒伏，除深耕、合理施肥外，还特别注意了勤灌浅灌。禾苗灌苞吐穗时，有64,000多亩田有青风倒伏的现象。这时，各地又采取了排水晒脚、赶露水、打黄土、架扶禾架子、牵绳子、剪禾叶等办法，积极进行了防治。

三、改革工具，解决劳力紧张现象。随着农副业生产的全面

跃进，工夫增多，带来了劳力严重不足的紧张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主张白天黑夜拼命干，长期加夜班；有些人（主要是上中农）则夸大困难，畏难退缩，开始打退堂鼓，主张降低增产指标，少进行一些技术改革；少数干部则感到苦闷压头，或者单纯向上面要机器；绝大部分干部、党团员、积极分子则提出了放手发动群众献计策，想办法，改革技术，改革工具，提高工效，坚决实现计划。县委认为：第二种和第三种态度都是错误的，必须批判；第一种态度虽然精神可贵，但很难持久；因此，积极支持了第四种也就是促进派的意见，依靠三部分人和积极分子，在全县范围内组织了一场先进思想与保守思想的大论战，开展了一个“人人动脑筋，个个想办法，大胆创造革新，爱社献计”的群众运动，通过算账对比，组织现场参观，进行评比竞赛，把广大群众引导到了改革工具、提高工效、坚决实现跃进计划的方面来了。并及时总结了群众的创造，抓住了我县农村需工最多最大的事项，提出了以改革工具为中心的“十五改”的宏伟规划。县委的这个号召，获得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各项发明创造有如雨后春笋，星火燎原，一个规模巨大的以工具改革为中心的技术革新运动迅速在全县展开了。截至六月底止，全县创造发明和仿制各种新工具300多种，推广了60多种，计30多万余件，新修大车道和田间道2,730公里，简易公路60公里。在仅仅四个月的时间内，全县即实现了运输车船化，犁田新式水犁化，中耕除草中耕器化，打稻机械化，揉茶机械化，碾米水碓、牛碾或机械化；除大山区和个别离产煤地区很远的地方外，还基本上实现了户户烧煤化，队队托儿所化，农忙食堂化。共计可节省劳动日1,400余万个，大大缓和了劳力紧张现象。现在这个运动正在向更深入的阶段发展。我

們体会到：要开展工具大改革，必須打破迷信思想，树立敢想、敢說、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把领导的决心和群众的积极性结合起来，坚决依靠群众，形成人人动腦筋，个个献計策的群众运动；必須按照当前农事上最迫切需要的东西出課題，引导群众去想办法；必須把創造与推广紧密结合起来。

四

农业生产大跃进，是一場人和自然的复杂斗争。是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必須加强领导，改进领导，才能适应一日千里的跃进形势。

一、加强领导，首先是加强作为领导这个斗争的司令部——县委，使它成为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随着运动的发展，曾经暴露出我們一部分县委思想准备严重不足，在几个重大問題上，如今年农业发展速度、工具改革、积肥等問題，都存在認識上的分歧，一部分人敢想、敢做，勇往直前，小部分人顧慮較多，按部就班，行动迟缓，因此，运动一度显得軟弱无力，这实质上是兩条路線的斗争在县委內的反映。据此，我們及时在县委內大胆开展思想斗争，根据总路線精神，对照检查各人对1,500斤县及各项重大增产措施的看法和态度，主要鋒芒是反右倾保守，严肃地开展批评。之后，并把右倾保守当作党内的主要危險，坚持不懈地进行清算。这样，县委在新的基础上認識統一了，战斗力加强了，真正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促进委员会”。我們認為这样做，对保証县委的坚强领导，具有头等重要意义。

二、改变干部作风，密切干群关系。在取得整风反右派的胜利后，我們抓住了以調整人民内部关系，主要又是調整领导与群

众关系为中心的整风，批判了某些干部的“三风”“五气”，脱离群众，强迫命令的作风。石亭乡党委会，曾经发生严重的强迫命令，干部打人，站在群众头上，影响极坏，县委发觉后，当即作了严肃处理。与此同时，县委又总结了清水江乡乡长张雪志和仙霞乡赵家塅社社長江运波贯彻群众路线、带头参加生产、密切联系群众、完成任务又快又好的好的典型事例，连同石亭事件的材料，交全县扩干大会对比讨论。通过这样学习正面反面材料，对克服某些干部强迫命令作风作用很大，他們說这是一堂深刻的具体的群众路线的教育。在这一基础上，我們要求干部做到三头（做事带头，头上光头，手拿鋤头）三同（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把作試驗田当作一项制度，規定“一人一亩地，出工五百分”，同时下放了大批干部。采取这样一系列的措施以后，干部和群众之間原来的一些隔阂消除了；干部以平等态度对待群众，群众也就更加信任干部，干群之間的真正同志式的关系建立了。五坊乡干部张景星，原来有严重的强迫命令作风。1954年搞統購統銷工作时，还曾經随便捆綁过人，群众喊他“张蛮子”，不敢接近他，大人哄小孩子莫哭，也用“张蛮子来了”吓唬小孩。1957年冬，組織上分配他去荷花社工作，他在党的一再教育下，深刻認識了自己作风恶劣，下了决心改正。在修水利时，他一連十二个晝夜沒有睡觉，到六月下旬已做了860分工，做到了劳动經常化，生活群众化。檢查生产时，还一边帶着粪箕拾狗粪，已經拾了二百多斤。现在群众再不喊他做“张蛮子”了，而是亲切地喊他做“张社長”。社干部徐依家說：“老張硬是出过了一道世。”均坝乡西塘社贫农彭大春看到我們干部的作风改变了，做了这样一首快板：